

中国通史故事全编
专制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明代历史故事
（之四）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故事/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1

ISBN 7 - 225 - 02048 - X

I. 中… II. 北… III. 历史故事—中国—先秦—近代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53 号

中国通史故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版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240

字数 600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 - 225 - 02048 - X/K · 148

定价 600.00 元(全 6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目 录 ☆

廷和忠直 毛澄拒贿	(1)
大同兵哗变	(4)
壬寅宫变	(8)
严嵩奸贪	(12)
徐阶新幸 严嵩败北	(16)
征剿河套	(23)
蒙古南犯	(26)
庚戌之变	(30)
俺答封贡	(34)
海瑞罢官	(37)
郑旺妖言案	(48)
利在国家、祸在身家的张居正	(52)
争立国本	(64)
葛成为何易名葛贤？	(67)
壬寅宫变	(68)
东南倭乱	(76)
戚继光平定倭寇	(80)
魏家阁老	(87)
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92)
布满中外的狐狗	(97)

九千岁的生祠	(100)
魏忠贤的侦探	(111)
魏忠贤的黑名单	(118)

◇ 廷和忠直 毛澄拒贿 ◇

杨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幼时聪明绝顶，十二岁中举，十九岁先其父成进士。正德时初，官至内阁首辅，勋阶光禄大夫、柱国。在刘谨、江彬用事时，只能委曲其间，对朝政大事稍有补救。武宗驾崩以后，至朱厚熜登极以前，共掌理朝政三十七天。在这三十七天当中，他一共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拥戴朱厚熜承袭帝位。其二是厘革正德时期的主要宿弊。

在厘革宿弊的过程中，杨廷和思想坚定、行动果断，很有魄力。首先是清除隐患，逮捕了拥兵在腋、图谋欲反的江彬及其党羽。其次是，裁汰冒滥。对锦衣诸卫及内官监、局中的旗校等挂名、冒滥人员，仅一次就裁汰十四万八千七百余人。同时对武宗的义子和以武宗名义违制传升、乞升的一切佞幸、官吏，大半被他斥去。除此以外，还令边兵回卫，遣散番僧、贡使和宫女，释放囚犯，停京师不急之工，收回武宗在“豹房”、行宫中储藏的一切金银异宝。同时，在为朱厚熜草拟登极《诏书》当中，除免天下税粮之半以外，还减收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因此，天下大悦，百姓称快。

朱厚熜登极以后，杨廷和汲取武宗荒政、失道的深刻教训，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对朱厚熜辅弼颇严。在大礼议当中，对朱厚熜推尊私亲的过于极端的作法，不仅敢于拒理力争，先后上疏谏诤达三十余本，还退还“御批”四次。对朱厚熜违背祖训的其它做法，更是谏言剴切、寸步不让。

比如，朱厚熜信仰道教，登极不久就在大内设醮，整日焚香祈祷。杨廷和便引证梁武帝和宋徽宗的故事来劝诫朱厚熜，说他们虽然溺信佛教和道教，但溺信的结果，梁武帝竟饿死台城，宋徽宗做了金人俘虏。又如：嘉靖二年（1522年）十二月，江左大灾，赤地千里，连岁歉收。而朱厚熜却在此时谕令太监，前去督催织造。礼科给事中章侨等多官进行谏止，朱厚熜不听。不仅如此，还谕令杨廷和起草敕书（督催织造的谕旨）。杨廷和对此不仅不奉命（拒绝书写），还十分激昂地说：“今臣等言之不听，九卿言之不听，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独二、三邪佞之言听之不疑。陛下独能与二、三邪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语气十分割切犀利。尽管如此，朱厚熜还是听不进去。更为可气地是，他竟又暗中谕令别人起草照办不误。最后不得已，只得嘱咐太监不要沿路“扰民”而已。

后来随着大礼议的激烈进展，朱厚熜对杨廷和感情逐步疏远，并增加了厌恶情绪。而杨廷和见朱厚熜越来越任性专断，势不可挽，也对皇帝失去了信心，于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便自动避职回乡了。嘉靖七年（1528年），朱厚熜谕令给当初阻止大礼议的诸臣定罪，结果杨廷和被削籍为民。嘉靖八年（1529年）六月，因心情不畅死于原籍。事隔数年以后，朱厚熜询问大学士李时，太仓所积几何了？李时说：“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此时，朱厚熜才又想起杨廷和，说：“此杨廷和功，不可泯也！”隆庆初年复官，赠太保，谥号“文忠”。

综括杨廷和的一生，忠直不阿，做事果断，为开辟嘉靖初政，立下了卓越的功劳，是个典型的封建忠臣，但他却自恃有拥戴之功，轻视朱厚熜年幼无知，做事比较专断。同

时，在大礼议中，争之太过，做法过激，缺乏应有的斗争策略。结果，被张璁等人钻了空子，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毛澄，字宪清，昆山县人。弘治六年（1493年）举进士第一。正德时期官至礼部尚书。朱厚熜登极以后仍居原官。在大礼议中，与杨廷和等人共持“人后说”。多次上疏谏言力争。因他官居礼部尚书，大礼议中的一切集官会议，都要由毛澄召集。因此，对朱厚熜来说，大礼议的成败，毛澄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朱厚熜看到这一点以后，为了使毛澄能够支持自己，便派遣太监暗中进行拉拢。某一日，一位太监来到毛澄家，刚一见面，太监便稽首下跪。太监本人虽然地位低下，但却往往代表皇帝传送谕旨，在这种情况下，大臣必须先向太监下跪领旨，才合礼仪。因此，这个异常举动，使毛澄惊愕万分。他急忙扶起以后，太监说：“上意也。上言：‘孰人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说完，还从怀中拿出重金。毛澄见此，勃然大怒说：“老臣悖耄，不能堕典礼！独有一去，不与己耳！”拒不接受贿赂。太监一看毛澄态度严厉，便自找台阶急忙溜走了。要知道，这份重金，不是一般的人所送，而是当朝皇帝所“赐”。对皇帝的赏赐拒之不受，就可能获“藐视上君”之罪。但毛澄为了维护明朝的统嗣关系，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种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尚品德，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却是十分可贵的。

太监回宫，将毛澄不受重金的事情面奏朱厚熜以后，朱厚熜虽然心里不悦，但却被毛澄大义凛然的精神所震慑，并未敢对毛澄公开治罪。

当毛澄看透大礼议的局势不可挽回以后，便以疾病为由，多次陈请离职。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因心情沉

闷，果然患病。当他获准离职以后，行至河北兴济，死于道途。死后，朱厚熜对其忠正品德不得不给予褒扬，追赠少傅，谥号“文简”。

◇大同兵哗变◇

大同是明代的边关重镇。嘉靖年间，这里不断遭到蒙古族军队的侵扰。为了巩固边防，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决定在城北九十里处建立“五堡”，作为抵御外族入侵的前沿堡垒。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五堡”即将建成，计划迁徙戍卒二千五百家开赴那里镇守，平均每堡驻扎五百家。消息传开，戍边军士议论纷纷。他们觉得，居住在距城二十里处尚且不断遭到侵扰而无宁日，现在要到距城近百里的“五堡”居住，若有敌入侵，谁来相救？于是表示宁死不愿迁徙。张文锦知道后，严令不许抗命。他派参将贾鉴对拒不迁徙者严刑处罚。此举招致了边卒的兵变。

哗变军士的头目是郭鉴、杨忠等人。他们杀死了贾鉴，聚集在焦山附近。张文锦怕叛兵与外敌取得联系，造成更大的危害，便招抚他们入城，随即捉拿首犯。郭鉴、杨忠等人见势不妙，鼓动叛卒焚烧了大同府门和都察院门，劫出狱中囚犯，事态进一步扩大。张文锦也遭到叛兵的追杀，逃到宗室博野王的住宅中。叛兵胁迫博野王交出张文锦并将其处死，还裂其尸首以泄愤。前总兵朱振被叛卒挟持出头作主，朱振提出三点：一勿犯宗室、二勿掠仓库、三勿纵火杀人，如果叛兵答应，便出头主事调解，否则宁死不从。叛兵表示愿意从命。

八月，朝廷决定由按察使蔡天佑继任巡抚，都督桂勇为总兵官，另派太监武忠镇守，同时派遣兵部侍郎李昆前往宣布赦免旨令。蔡天佑来到大同后，会同武忠、桂勇等召集叛乱军卒宣谕朝廷旨意，局面稍有缓解，但是仍然不时有抢劫事件发生。总兵官桂勇处死了五十余人，其余均被赦免。然而城中依然人心惶惶，到处传言“必尽杀大同人”、“京营暨诸镇兵已驻近地，剿大同矣”等消息。时逢户部派进士李枝因公务来大同，遂被认为是传“密旨”来的。当晚众人又聚集出来，到李枝住处讯问究竟，李枝出来向众人解释清楚之后，人群仍未散去，他们杀死了据说是曾经提出诛杀叛卒建议的知县王文昌，纵火烧毁民宅百余家。第二天，又围逼代王府，代王怕有不测，率家人逃遁。巡抚蔡天佑一边竭力安抚众人，一边向朝廷请示解决方案。

十一月，户部侍郎胡瓚、都督鲁纲率军征讨大同叛卒，称“诛首恶，胁从不问”。大同城中军民心中恐惧，求蔡天佑出面保护他们。蔡天佑再次重申，“兵来惟诛首恶，胁从不问也。汝辈勿助恶即为良民，无事矣。”众人得此允诺人心稍定。总兵官桂勇设计擒住首犯郭鉴、杨忠等十一人，全部斩首示众。郭鉴的父亲郭疤子纠集胡雄、徐毡儿等人再次聚众作乱，围住桂勇的家宅，抓住桂勇，杀死桂家数人。蔡天佑与武忠赶来反复讲明道理，桂勇方幸免一死。蔡天佑处死了徐毡儿等四名首犯，郭疤子逃走，胡瓚想发兵追杀，被蔡天佑阻止，称“首恶即诛，余党釜鱼耳，易处也。”胡瓚遂班师回朝，被一些人上疏弹劾为“讨叛无功，逆党未尽得。”第二年二月，郭疤子纠集同伙数十人潜入城中，乘夜晚焚烧民宅。待天亮之后，蔡天佑擒住郭疤子等四十余人，全部处死。此次兵变终于被平息下去。

嘉靖十二年（1533年），兵部议设总制重臣于大同，意在加强这里的守备力量。兵部侍郎刘源清被任命为总制，都督郤永为总兵。十月，大同总兵李瑾建议在城外挖一道四十里长的濠沟，用来阻止外族的骚扰。刘源清赞同此议，限定三日完工。李瑾平素就十分严厉，此时为赶工期便不断严刑催促，士卒不堪忍受，终于又激起了兵变。哗变士卒杀死了李瑾，围住了巡抚潘傲的府第。潘傲跳墙逃脱后，向上言书：“镇将用法苛刻，兵悉变，请置勿问。”而刘源清则主张“即兵悉变，法不可废，请讨之。”他又在大同城中张榜告示：“五堡之变，朝廷处（罚）太宽。乃今稔恶戕主帅，天讨所必加者”。僉事孙允中希望刘源清不要动武，更不要旧事重提五堡兵变的旧帐，免得扩大事端。刘源清以为前次胡瓚“以兵不临城，致言者纷纷，吾不可更袭前轍。”刘源清的做法，引起五堡遗属的猜忌。他又派人搜捕乱党，而在被捕者的名单中大都为有功之士。各镇士卒抗拒捕快随意抓人，双方冲突升级。刘源清率军来到城下，大肆杀掠，郤永也带领军队来到城下。五堡遗属见状尽数哗变，他们关闭城门，拒城自卫，与官军对峙。潘傲、孙允中眼见无法控制局面，遂上疏军官妄杀无辜激起兵变的实情。刘源清也上疏称巡抚潘傲姑息逆党，致使镇卒与王师对抗。潘傲被弹劾、罢官。

十一月，兵部尚书王宪称“大同之变，非大发兵诛之不可。”辅臣张孚敬也同意此说。于是任命江桓为总兵，参政樊继祖为大同巡抚。樊继祖恐怕叛卒与外寇联合，决定自己单骑入城晓谕军民，平息此事。但这个建议被搁置。刘源清则一再上疏，“宗室，诸文武悉已从贼，实天欲弃此城矣。”朝廷有旨命其攻城。刘源清一面攻城，一面命人决水

灌城。哗变军兵拒城顽强抵抗，官军攻城未果，双方相持不下。其间，叛卒与外族取得联系，鞑靼骑兵在其首领小王子的率领下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正月大举来犯。平定大同叛兵的官军不得不分兵抵御小王子的入侵，郤永率军迎击鞑靼兵，结果作战失利，鞑靼骑兵在边关一带大肆劫掠数月后退去。

二月，刘源清请设总制御外，自己专事攻城。朝臣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指责刘源清贪功引水灌城，现在攻城未果，又引来外族侵扰，以致震动京师。主张罢去刘源清，另择他人处理此事。刘源清无奈，传话城中只处置首犯，其余概不论处。城中一些人闻讯决定作为内应，擒拿首犯，迎接官军。刘源清表面应承与之相应，但他出尔反尔，不守诺言，结果此计失败。朝廷罢免刘源清，任命户部侍郎张瓚代刘源清为总制。张瓚来到军中下令不得攻城，派主事楚书来到城下。城中叛兵表白说，“吾辈非杀将者，畏死自全耳！”楚书进入城中，声言“用兵非朝廷意”，众人皆呼万岁。楚书与哗变军兵达成协议，斩倡乱者，迎官军入城。当夜杀黄镇等二十四名首犯。巡抚樊继祖也进入城中，安抚人心。郤永仍想从中阻挠，散布流言“继祖伏兵为内应”。当夜又引起不安，樊继祖沉睡不起以示无事。张瓚命令官军后退二舍之外，自己来到城下，张榜晓谕，开仓赈济。城中军兵依次拜谒，以示臣服。兵变至此得到平息。

朝中得知兵变已经平息，降旨论定功过，核查兵变的原因及过程。不久，刘源清、郤永被捕入狱，被削籍降职。潘倣、孙允中官复原职。张瓚、樊继祖等有功者均有封赏。

◇壬寅宫变◇

宫婢弑君 世宗昏厥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夜里，朱厚熜睡在他的宠妃——端妃曹氏宫里。宫婢杨金英、苏川眈、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张金莲等十几人，事前用多根细料仪仗花绳，总搓一条，待朱厚熜睡熟以后拟将他勒死。但在行动时，因思想紧张，一时慌乱，绳子被结成死扣不能收紧，结果只造成昏厥，未能毙命。同时，又因张金莲见事不就，中途思想发生了动摇，转而又去报告皇后，致使“谋逆”未成。此时正是十月二十二日凌晨五点左右。当时所有灯火全被宫婢吹灭，端妃宫内漆黑一团。方皇后闻讯赶来，虽然在黑暗中被姚淑翠打了一拳，但因管事牌子等多人也已到达宫内，宫婢的造反精神顿时沮丧。结果，杨金英等十几个宫婢均被一一拿获。这时朱厚熜脖颈上的绳索虽然被左右侍从立即解下，但已经昏厥不醒，气息微弱。于是急令传召御医。御医到来以后，面对这种危重情况，都惧怕获罪，面面相觑，不敢下药。惟有太医院使许绅，因为有职衔的关系不能推脱。不得不冒死下奇药进行抢救。他用桃仁、红花、大黄等下血诸药，辰时（七、八点钟）灌下，未时（下午二、三点钟）朱厚熜便忽然作声，随后吐紫血数升，申时（四、五点钟）遂能说话，又连下三、四剂平气活血诸药，“圣躬遂安”。

事后，朱厚熜以许绅抢救有功，晋升为太子太保，礼部

尚书、封官一品，荫子孙四世。许绅虽然获得从重封赏，但事后一想此事，仍是惊悸后怕。不久，便因此事患病而死。死前曾对他的好友说：“吾此药自分不效，必先自尽。盖绅亦不能保其必瘥也。”这就是说，许绅在下药之前，心里也没有多大把握。如果对皇帝抢救不活，自知必然要身罹重祸。因此事先已经做好了自尽的准备。

《明世宗实录》讲，这次弑君的首谋是宁嫔王氏。但此事却发生在端妃曹氏宫里。因方皇后嫉妒曹氏受宠，所以趁朱厚熜尚未苏醒不能理事之际，便诈传召旨，将宁嫔王氏、端妃曹氏和在场所有婢，包括张金莲在内，不论首从“悉磔于市，仍剐其尸梟市。”同时，还斩其族属十余人，发功臣家为奴者二十人，个个家产全被抄没。

皇帝暴虐 宫婢拚命

这里有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十几个细弱少力的青年女子，竟然要冒着株连九族的死罪，去勒死皇帝呢？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是宫廷秘史，不论当时的官书还是私书，均未敢详细披露。只有当时的刑部主事张合，在他后来所著的《宙载》一书中，对宫变的原因提供了一点线索。书中有一段刑部审讯宁嫔王氏和杨金英等人的口供。在宫变之前她们曾商量说：“咱们下了手吧！强如死在手里。”这句话，虽然只能表明宫婢们造反的决心，还没有道出“强如死在手里”的真正原因。但仅从这一句话，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宫婢肯定已经预感到，必然有什么足以置她们于死地的不祥大祸，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消极等死，不如拚命。

根据《明世宗实录》所载的史实分析，这些宫婢拚命

造反的原因，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朱厚熹暴虐不仁，宫婢忍受不了深宫内廷的非人待遇。朱厚熹偏听偏信，护短记仇，喜怒无常，擅长杀戮。文武群臣偶有小过，轻则受到斥责、罚俸，重则仗笞贬官，甚至还要被逮下狱。这种暴虐的性格，就是对皇后、嫔妃等内宫所有的人，也是如此。

孝洁皇后陈氏，是朱厚熹的原配皇后。在嘉靖七年（1528年）九月的一天，朱厚熹正与陈皇后对坐闲谈。此时，恰有张、方二妃进来献茶。朱厚熹见二妃手白细嫩，便不顾陈皇后在此，当场拉过抚摸。陈皇后见此情景，妒意顿生，以“投杯起”表示不满。朱厚熹立时大怒，这一怒之下，便把陈皇后吓得魂飞丧胆，惊悸堕胎。没过几天，便于嘉靖七年十月初二日身亡。

临死之前，陈皇后十分想念她的母亲冀氏。为此，她的父亲陈万言曾多次上疏陈请。但朱厚熹不但不允，还对辅臣说：“外戚自古未有入宫禁（者）。假以视病为言，多窥伺朝廷者。在彼为得计，在其君为堕计也。”提防外戚篡权，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此时陈万言并不一定有这个歹意，只是朱厚熹嫌恶陈皇后借故托词而已。既然朱厚熹对陈皇后已经有了恶感，所以死后谕令礼部从简发丧。

陈皇后死后，朱厚熹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立顺妃张氏为继后。张氏当了皇后以后，虽然受到朱厚熹的宠爱，但由于为张鹤龄、张延龄二人下狱论死事件讲过情。结果惹怒了朱厚熹，就在讲情的第二天早晨，即嘉靖十三年一月初六日，张皇后就被废黜了。到了嘉靖十五年（1536年）闰十二月初三日，张皇后因长期受到冷遇，忧郁身死。

张皇后被废黜以后，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一月十五日，立德妃方氏为继后。“壬寅宫变”当中，方皇后虽然抢救朱厚熜脱险有功，但她诈传诏旨，借机将朱厚熜的宠妃曹氏也给处死，而引起朱厚熜对方皇后的不满。因此，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初五日，内宫失火，方皇后遇难时，朱厚熜竟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当时方皇后虽然未被烧死，但却受到惊吓，于十一月十八日死于此难。方皇后死后，朱厚熜虽然表示悲痛并谕令从重发丧，但通过这件事情，他心狠毒辣、阴险虚伪的面目，却暴露得十分清楚。

对待皇后的态度竟然如此，那么对待出身低贱、视如草芥的宫婢和被冷遇失宠的宁妃王氏来说，更可想而知了。朝鲜《中宗大王实录》卷十，曾对此事讲道：“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又说：“以皇帝笃道术，炼丹服食，性寝躁急，喜怒无常，宫人等不胜怨恨，同谋构乱云。”另一方面，这些宫婢都各司其职，各保其主。而皇后、妃嫔和淑女之间，为了争得宠位，彼此妒忌私斗，矛盾错综复杂。这些斗争，不论哪一方面失败均要株连手下宫婢。轻则挨打，重则处死。这些非人的待遇和矛盾漩涡，都会直接威胁着这些宫婢的人身安全。

另一种可能是，朱厚熜用宫婢的经血烧炼“红铅”，宫婢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折磨，起而造反。邵元节、陶仲文，还有唐珠珊等方士、道流，为给朱厚熜烧炼“红铅”，不惜收取女子经血。在收取经血过程中，肯定不会让这些女子使用各类软纸，必然要强制放上接取器物。甚至为高量采取，有可能让这些女子服食坏血之类的药物。这样，就会造成失血过多或者血崩。经过这样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这些

女子，即便当时不死，事后也必然极度虚弱，最后丧失性命。同时为了防止丑事外扬，说不定取完经血以后，还要将这些女子杀身灭口。

总之，深宫内廷草菅人命的非人待遇、惨无人道摧残女子的罪恶行径和多少同伴被折磨致死的悲惨状况，杨金英等人肯定历历在目，亲有所睹。这一切，必然要激起所有宫婢的无比愤怒和激烈反抗。既然已经预感到此祸就要临到自己头上，明知事情难成，不如和这个暴虐的皇帝决一死战，拼个死活“强如死在手里”。

虽然朱厚熜经过这次宫变的致命打击，几乎毙命，但他并没有从这件事情中汲取教训和表示忏悔。只是以后不敢再采取青年女子的经血，而是改选八至十四岁的童女。究其原因，便是这些幼小的童女，年幼无知，容易摆布，不会发生造反的行为。从选女改换年龄一事来看，发生宫变的真正原因，第二种可能性较大。

◇严嵩奸贪◇

世宗的昏愤，使奸臣有机可乘。明代有名的大奸臣严嵩，就是出在这个时候。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善写诗文，原先只是翰林院里的小官，凭着他阿谀谄媚的本事，步步高升。在争论世宗生父朱祐杭的尊号时，许多官员被廷仗、罢官或贬谪，严嵩却迎合世宗的旨意，并悉心筹划礼仪，因而取得世宗的欢心。严嵩进而施展他的文才，为世宗撰写祭祀的青词。这对崇奉道教的世宗来说，是再称意不过的了。嘉靖二十一年

(一五四二)，他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开始掌握重权。两年后又进升为首辅，从这时起到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严嵩被罢官时止，中间仅两年多的时间首辅是由夏言担任，其余都是严嵩，前后柄政达二十年之久。

严嵩除了善于献媚讨好外，并无其他特殊的才干。他所以能窃权弄奸，主要是由于世宗昏愤。世宗深居西苑，专事斋醮祷祀，二十几年不到大内视事，朝臣中除严嵩外，都见不到他的面。严嵩为表示勤恳和为了随时窥伺世宗的意向，则日夜侍候在西苑板房。世宗因此对他更加信任，表彰他“忠勤敏达”。严嵩利用自己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斥同僚。世宗下了什么样的圣旨，说了些什么话，即使是内阁的辅臣，他也不让知道；票拟之事，更不让其他阁臣参与。于是，大权尽归严嵩，使他得以售其奸。

严嵩入阁之时，已经年过六十，老朽糊涂。世宗御札下问，他常常是瞠目若呆，摸不透其中的旨意。但是，他有一个奸猾机灵的儿子严世蕃。严世蕃仗着父亲的权势，官至工部侍郎。他晓畅时务，颇通国典，见了世宗咨询的手札，往往能揣摩曲中，迎合世宗的意思奏答。他又以重贿收买世宗的近侍，叫他们把世宗的言动举措，无论巨细都向自己报告。因而，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时，他都早有准备，办得让世宗很满意。严嵩见儿子奸猾，便偷偷让他入直代为票拟办事。诸部府有事请他裁决，他也总是说：“等我与小儿计议后再定。”所以，朝廷上下都说，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而严嵩不能一天没有其儿子。有的人则干脆称“大丞相、小丞相”。官员在严府求见请示严世蕃的，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有些官员在严府等了一天整天都得不到召见。士大夫